

# 讀書通訊

第一卷

## 學術講座

沃立與杜威……………孟憲承

傅模移寫 畫家末事……………俞劍華

論修史工作中之「記注」與「撰述」……………王蔭鐸

歷史與求真精神……………錢君曄

## 讀書指導

論讀書與治學……………程宗潮

介紹艾偉著出席澳洲新教育國際會議記……………周君放

評姚枬譯註緬甸史……………劉仁成

周著「抗癩教育」述評……………楊同芳

## 圖書評介

## 參考資料

教育部三十五年度自費留學考試試題……………本社輯

## 海外學訊

美國大學教育及圖書館……………嚴文郁

孟憲承

威

杜

與

立

沃

「現代教育思想從道德哲學的觀點說，可分為理想主義與自然主義兩大派別。理想主義視道德是超越人生，而根抵於宇宙的永恆的真理與定律的。自然主義則認為道德不越人生，只是為欲望和利益的滿足的。因此對於教育，理想主義要求有確定的目的和標準；主張傳授兒童以超個人的文化價值；重視紀律與權威在引導他們發展中的必要。自然主義相反：它傾向變化，試驗，而厭惡抽象的目的；偏重文化的變動性，而主張以教育適應社會和個人的當前需要；鼓勵兒童的生長，却只為「長，而不願決定它的方向。」(Ulrich, *Fundamentals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p. 102)

「二十世紀初，新教育論者，開始他們對於傳統教育的目的和方法的種種批評。這些批評，在歐洲，是從新理想主義的哲學出發的。但在美國，就只依著實驗主義一個觀點。」(Ibid., p. 103)

「實驗主義作為近於理想主義抑自然主義的解釋，對教育，乃至對民主的前途，都有極大的影響。如果我們相信人只需新的經驗，而不問經驗的標準，那麼民主社會也只需變化，只需試驗，沒有必然的理由要確立自由，友愛，負責，明智，為其規範的理想了。……甚至民主的自身，既不過起於社會偶然的變化，依於人們思想的習慣，到了有權力者感到民主不利於己的時候，也就可以改變它，推翻它；這樣，民主也沒有必然的價值了。」(Ibid., pp. 129—130)

以上直引沃立(Ulrich)的幾段文字，想他自己的話，表明他著書的旨趣。

沃立(Robert Ulrich, 1890—)是德國教育家，一個愛好民主的人。納粹執政後，他移居美國。從一九三四年起，一直任着哈佛大學的教授。先後出版的著述很多，主要的有：

民主教育本旨——教育哲學：(Fundamentals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merican Book Co., 1940)

教育思想史：(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 American Book Co., 1945)

教育思想選輯：(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 Selections from Great Documen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教育思想史，凡二十篇；從柏拉圖起杜威止，不僅是前人思想的重述，而是二十篇批評的論文。其中美國思想家，除杜威外，還有富蘭克林，哲佛孫，愛默孫三篇，為同類的他書所不經見。卷後所附參考書目錄，佔五十二頁，也比他書為完備。選輯是史料，採集諸家原著的菁華。各冠以簡短的序論。柏拉圖之前，加上了印度與中國的古代教育思想；中國部分，節錄老子、孔子(學記與大學)莊子的英譯。這書雖與前書平行，也可當作另一部教育文選看。這兩部書，無疑是最近對教育史上的重大貢獻。他的教育哲學，則如上所說，是理想主義對於實驗主義的批評，解釋，和折衷。

現在先略述沃立自己的思想。所謂「道德是超越人生，而根抵於宇宙的永恆的真理與定律」這句話的意思，涉到他的形上論的假定。他說：宇宙的本體是什麼，前人說它是物或是心，是自然或是理念，這樣各執一詞，而有學說的對立。這是因為人的思議，言說，總局限於其一個側面的緣故。其實它是物與心的統一體：是一個大生命力。是自然也就是理念。這雖若不可思議，而這點「信仰」，正是我們自己窮理致知的先決條件。試想，自然界如果不就是「理」(Logos)，那麼，一切自然科學所探求的定理，還有什麼確立的可能呢？人是身與心的統一體。他生活在宇宙中間；他的生命，不是自己所創造，而只是宇宙大生命的一支流。我們被這大生命所彌綸，所含有，不管自己願意不願意。我們雖感覺自己佔有這生命，而同時這生命實在超越我們，也可說，它佔有我們。人類生命力

的衝動，在原始的形態，是需欲與傾向 (needs and propensities)；在最高的形態，便是良知與道德。道德行為，起於生命力的欲求；它不是社會習俗或個人主觀所決定，而是萌抵於宇宙的大生命裏面，為它的永恆的，必然的動向。道德是這樣，其它文化的價值與理想，也都是這樣。理想是超個人的，宏觀的，因為是內含於全宇宙的生命裏面的。

我們的智能怎樣發展，人格怎樣完成的呢？需欲與傾向，藉着行動與知覺的能力 (executive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表現出來。舊所謂意志，情緒，智慧，都不過是表現的不同方式。因為傾向和能力的相聯，是不固定而富於變化的，所以有發展的自由；是受着稟賦與環境的影響的，所以有個性差異；是朝向一定的目的的，所以有人格的完整。文化與教育，規定共同的，超個人的目的，使人格在「生長」(growth) 中有理想的「範型」(form)；使每個人依這範型，去決定自己的「生活計劃」(life plan)。假使他的生活計劃，符合他的個性的要求，而給他的傾向與能力以完滿的表現，那他就享受着和諧的人生，而發見了自己，完成了自己 (self realized)

「任何民族，任何時代，能够融合「生長」與「範型」，也便能够統一「理智」與「信仰」，而有文化的勃興。二者如有矛盾或偏廢，則文化必趨於衰落。」(Ulrich, *Fundamentals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p. 338)

沃立對於杜威的批評，就着重在這兩點：一，他只言生長，不立目的，沒有生長的範型；二，他只重理智，而完全忽略了宗教的信仰。沃立以為西方教育，向來以基督教與人文主義為其最高的指導理想。在近世教育思想史上，廓美紐斯和裴斯泰洛齊都充分代表這種理想。到海爾巴德，已只有人文的興趣，而沒有宗教的熱忱。到杜威，便只代表現代科學與工業的趨勢了。他主張今後的教育，必須

「培養一種道德的態度，使能綜合實驗主義的精神，與對於人生深義的信仰。」(Ibid., p. 189)

在教育思想史的末一篇，著者分析杜威的哲學，而指出它的發展，可分為兩個時期。一八九四至一九三〇為第一期；一九三〇以後為第二期。杜威第一期的思想，是極端的實驗主義，他對十九世紀的唯心主義 (idealism 汎譯理想主義) 作無妥協的抨擊。到第二期，他便溫和得多，而有了折衷主義 (eclecticism) 的趨向。

實驗主義的優點是：它鼓勵科學的思想態度；它解除傳統的束縛，不主故常，力求變化，要人憑着智慧與勇氣，去改造環境，改造自己，對人類的進步，引起無窮的希望；它啟發人們互相寬容互相尊重的民主精神。但也有它的缺點。一則它的指責唯心主義，造成許多偏見和誤解。杜威在一篇思想自傳 (Dewey, "From Absolutism to Experimentalism", in *Adams and Montague,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y*, Vol. II) 裏，自己說在他的學生時代，那些神學的哲學教授，怎樣引起他的懷疑和厭惡。他的攻擊唯心主義，一部分是對自己少年時哲學訓練的反響。同時他也承認他受黑格爾哲學的淵源。這一點，他的許多美國信徒，似乎沒有十分注意。他所謂生長，指經驗的變化，改進，指它的日新又新，精進不息的歷程。人生經驗，具有這自行求進的動力。所以一切理想，目的，方法，技術，都會從經驗自身裏發展出來。理想是「內含」(immanent) 於經驗而不是「超越」(transcendent) 經驗的。這樣的「內含目的論」(intrinsic moral teleology)，應該使實驗主義與理想主義可以互相接近的，却因為許多偏見和誤解，只顯得它們的互相不相容，這是深可惋惜的一點。再則他的教育學說，也有偏而不全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只言生長，不定目的，說生長是變化不息的歷程，不可以任何固定的目的，來限制這歷程。不知崇高的理想，完美的範型，原是萌抵於宇宙的生命力裏面，而為人所企求而永不能得的。如基督教的「愛」，科學的「真」，藝術的「美」，這些理想，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永遠鼓舞人生的向上的。怎樣會限制生長，阻撓進步？

一九三〇以後，杜威的思想有一個確定的轉變。不是因為他感於民主信仰的動搖，或其他的生徒對於他的學說的錯解，還是因為他自己經驗的變化，那不能斷定。總之，他開始說到目的，說到信仰了。在所著共同的信仰裏，他就這樣說：

「理想的目的，對人所具的權威，是一個無疑的事實。人類對於正義，慈愛，真理的信從，是這樣確然不移，已不需要宗教再加上教義和信條的

累贅。」

「我們信仰所繫的理想，是不模糊的，不搖動的。這種理想，具體表現於我們對人間關係及其所含的諸般價值的了解中間。生存於現在的人們，是人類從遼遠的過去到遼遠的未來的大生命的一環。我們文化中最寶貴的東西，不是我們的，是靠著無量數人的勤勞苦痛纔存在的。我們的責任，在於繼往開來，將這些價值，保存了，甄別了，擴充了，而貽給後來的人，使他們能够把握得更堅牢，分享得更普遍。這樣的一個信仰，不拘於任何宗派，任何階級，任何種族。它本是人類所默契的一個共同信仰，現在只須把它說明而加強便好了。」(Dewey, *A Common Faith*, p. 44; p. 85.)

沃立引了上文，接着說：

「還不復是實驗或工具的價值論了。我們可以信仰「不模糊的」，「不搖動的」理想了。可是這些理想怎樣會產生的？杜威願意哲學的思辨，到此而止。但哲學決不會停止於此；它要求經驗主義檢討它自己的形上論的假定。」(Ulrich,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 pp. 333-334)

實驗主義的力量，由於它是一個動力的哲學。它相信在人生經驗的變化不息的動力之中，內蘊着它的理想和規範，而賦予人生以日新的意義和方向。沃立再三指出，這種「內蘊目的論」，使得實驗主義不難與理想主義相調和。事實上，美國一般實驗主義者所表現的，是對人類進步無限的樂觀，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深切的信仰。這種樂觀和信仰，雖則是無批評的，却正是最有力量的。

「說不定百年之後，哲學史家會這樣說：詹姆士和杜威是生於實驗科學與工業技術發達的時代，看到舊時先驗的理想主義，已失掉了它的依據，所以想另建一經驗的理想主義以代之的。」(Ulrich, *Fundamentals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p. 129.)

讀過了沃立對於實驗主義的批評和解釋，再細按杜威的原書，引起我們如下的觀察。

(一) 經驗與自然：沃立的民主教育本旨，和杜威的民主與教育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的出世，相隔了二十五年。兩部書，紀錄兩個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教育感想。雖則一樣倡導民主，而樂觀的成分自然不同。沃立目擊歐洲民主的崩頹，對於美國的保衛民主與世界和平，懷有很切的期望。他接觸到美國實驗主義的活躍的精神，但不能忘却歐洲的宗教與人文主義的傳統；他恐懼民主信仰的基礎，將因宗教的衰落而動搖。因此他想給實驗主義一個理想主義的解釋。這點深意，一定有許多人和他同情的。

但是他說到一九三〇以後，杜威的思想，漸變為折衷主義這一點，未必有許多人會同意。杜威的哲學，特別是在它的後期，顯明地是一個經驗主義 (empiricism) 或實驗主義 (experimentalism)。這兩個名詞，在他是並用或互用的。因為一則他所謂經驗，指人與環境的交互行動；行動為主，而知識次之，知識起於行動，而成於其在行動中的考驗；這與十七世紀的感覺經驗主義迥乎不同。二則這種物我相交知行合一的經驗，以實驗為其通性，科學上控制的實驗方法，也就是從人類長期的經驗中提煉出來，發展成功的。所以名這經驗主義為實驗主義，意義更加明確。杜威始終堅持這個立場，在一九三〇的經驗與教育中還說：

「在許多疑難之中，只有一個永久的參照點，即教育與經驗的不可分。新教育哲學，只有根據一個經驗的，實驗的哲學。」(Dewey,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p. 12)

至於這經驗的哲學，應該作為理想主義抑自然主義解釋的問題，他在一九二九的經驗與自然的開頭就說過：

「這哲學可稱為經驗的自然主義，或自然的經驗主義」。(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 Ind. edition, Ch. I) 他自己的解釋是這樣。別人所作別樣的解釋，那是別人的思想了。

(二) 生長與目的 沃立所不滿於經驗主義的教育哲學的第一點，是說它只提了生長一個概念，而沒有規定生長的目的。這確是多數杜威的讀者所最感迷惘的，並不是沃立一個人或第一次的批評。

在這裏，我們必須提起兩派哲學態度上一個根本的分別。超經驗的（唯心的）哲學所求的，是真理，是抽象，是常恆，是最後；而經驗的哲學所涉的，却只是殊事，是具體，是變化，是當前。以目的問題來說，人生經驗以內的目的，是人的，不是天的。凡是人的目的，就都是一個人，在一件事上，行動的效果的預期。這種目的，和行動或手段分開。一個行動歷程，分兩端來看，其起點和中間是手段，終點便是目的。但這是相對的，可變的：一個目的達到了，就變為次一行動的手段（end converted into means），則不但目的永遠不能達到，連它的意義也不能確定，而只成了空虛的幻想，或偏見的護符。如果把目的分析為一項一項具體的，當前的手段，那麼，它的意義明瞭了；它的正確與否也當前立辨；人不能夠再以抽象目的之是，來掩飾具體手段之非了。（Dewey,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P. 35）這個標準，應用於道德問題，實在非常嚴格。說經驗主義的目的論，切近實際，缺少想像，規規於事為，汲汲於功效，不像理想主義的冥心孤往，引人漸向一個莊嚴聖潔的境界，是對的。說它沒有目的論，顯然不對。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杜威說，生長是經驗的變化，改進的歷程，同時也是它的目的：這是教育可能有的最廣泛的目的。它廣泛到和人生一樣；幾等於說：人生的向上，是歷程，同時也是它的目的。這裏，經驗主義比理想主義謙卑得多，它不能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超脫現實的人生，而從宇宙的立場，指示出人生的大目的來。人生的目的，理想，標準，內含於人生歷程以內，而在不息發展之中，沒有先知能夠給它全部預定。教育，除傳統宗教的部分以外，既必須在經驗以內進行，怎樣能有超經驗的目的呢？經驗在不息變化，固定的目的，是不是阻礙變化呢？實際教育所必需的目的，是具體的，個別的，當前的；是一個一個兒童或青年在一項一項活動中的效果的預見。只有這樣的效果的預見，能夠供給他們學習的動機，持續他們的努力。新教育的基本概念之一，正是「目的性的活動」，怎樣能說它沒有目的？

若問，除了具體，個別的目的而外，有沒有可能成立若干比較抽象的，概括的總目的，作為我們教育的全體綜觀呢？答，這不僅可能，而是實有。這樣的總目的，在理論上，在事實上，是一直有的。生長就是理論上最概括的一個總目的了。另外，杜威也詳細分析和比較過前人所提的各種目的，如「自然的發展」「社會的效能」「文化的陶冶」等，而說：

「教育者所最關切的，是當前的，具體的，個別的目的。那些抽象的，概括的總目的，應當作為現前活動的全部展望；其價值也看它們裨益於具體活動的了解有多少。對於它們，我們不須作任何選擇。我們所必須選擇的，是在什麼時間，有什麼活動。至於那些大目的，只是同一情境的幾個看法，儘可以兼容並包。沒有人能夠同時爬上幾個山頭；但幾個山峯都爬過了，所俯瞰到的遠景，是互相調和的，決不會看出幾個互相抵觸的世界來。教育的總目的，既是全部教育的不同的展望，那麼，每一說，着重了一類問題，一種觀察，甲說詳乙說的所略，補它的所偏。這樣的總目的，當作我們研究的「假設」（hypotheses）看，愈多愈好。」（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P. 129）

沃立對於實驗主義的全部批評中，最緊要的一點，是指出它的「內蘊目的論」。他想抓住這一點，來把實驗主義作一個理想主義的解釋。可是一涉教育目的問題，他也仍和別人一樣籠統地說杜威只言生長，不言目的，沒有生長的類型。這點自相矛盾，使他的實驗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調和，結果只顯出了他們的分裂。

（三）理智與信仰 其實，他所不滿於經驗主義的教育哲學的，還在於第二點：就是，指責它偏科學的理智，工業技術的效能，而蔑視了宗教的信仰。關於這一點，沒有人對杜威有什麼誤會。

科學對宗教的矛盾，是近世哲學上一個苦悶的問題，培黎（Pain）曾說過：「哲學從來服事着兩個主人，——科學和宗教。哲學者自己也常兼有兩種求知的虛心，和度人救世的熱望。在中世紀，哲學不過是神學的侍從。到十七世紀自然科學興起以後，裂痕深了，但情勢還不急迫。哲學家一方面還對宗教效忠，一方面也還有那時代的科學，如數學，天文學的造詣。真正宣告傳統哲學的結束，科學與宗教的分離，而逼得以後的哲學家非決定一個取舍

# 傳模移寫畫家末事

俞劍華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綜合各種畫法，定成六法，以為習畫論畫的根據。他那六法的條目是：

「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

這六法有兩種用途，一是用以習畫的，次序要由下而上，先習古人或師傅的稿本，然後學習章法的布置，次再觀察萬物的形色而實地寫生，寫生既有把握，再講究骨法用筆，經過多年的修養，最後方能達到氣韻生動的地步，到此地步已經可以說是爐火純青，有了成家的希望。一是用於論畫或看畫的，要由上而下，一幅畫先要看有沒有氣韻？若氣韻不佳，便非佳畫，而氣韻的有無，又可一望而知，所以列為第一項，次再研究用筆的優劣，形狀色彩是否正確無誤？章法是否穩妥？最後再看此畫是臨摹古人的稿本，抑係自己創作？以判定價值的大小。所以六法既適用於畫家的習畫，又切合於鑒賞家的看畫，歷代論畫的人，對於六法，都極力推崇，六法，早已變成國畫的代名詞，除了明代謝肇淛清代鄭一桂稍有異議外，（註一）到現在還都奉為金科玉律，以為是「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註二）的。

六法的條文，古今均無變化，賦彩間作傳彩，意義相同，惟第六項則各書互異，茲彙列於下：

- (一) 傳移模寫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明代王氏畫苑本，清代佩文齋書畫譜本，現代美術叢書本
- (二) 傳模移寫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王氏畫苑本，明謝肇淛五雜俎——佩文齋書畫譜本
- (三) 傳模移寫 宋郭若虛畫見聞志——掃葉山房本元鈔本模作模
- (四) 傳字移寫 近代陳師曾文人畫之價值——中華書局本
- (五) 傳移換寫 現代余紹宋畫法要錄——中華書局本

從（一）到（四）不是「模移」和「移模」的顯成「換」字，否則這四個字自己中間起了矛盾。倒，就「模」字的別寫，所以在意義上都不成問題，既無根據，又不合理，不知余氏何以把這個字弄題，惟有第（五）將「模」字改為「換」字，模錯了。

與換却處於反對的地位，余氏並未註明用何種版本。余氏著述態度十分謹慎，不應在全書第一條最緊急的項目下就有誤字，較余氏畫法要錄早出的書，都沒有作「換」的，「模」字在這裏又是最重要的一個字，不能隨便變成他字，更不能變擬，一方面可以探討古人的成法，接受古人已成

不可的，是休姆，康德兩個人。到十九世紀他們所各自引起的實證主義與浪漫（唯心）主義，便截然對立了。「實證主義是科學性的哲學；浪漫主義是宗教性的哲學。在現代哲學上代表兩派的，就是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了。」(Perry, 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 Ch. II)

杜威的那種經驗主義，既然是自然主義的，它的不能含有超自然的宗教性，原無可致疑。沃立民主教育本旨的「教育與宗教」一章中，討論了科學與宗教的矛盾以後，列舉現代人所有的四個宗教學說：一，正宗說 (fundamentalism) 二，同一說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identity 指宇宙內蘊的神性與人類理智的相同)；三，矛盾說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paradoxical analogies 指信仰之為信仰即在於其與理智的矛盾)；四，象徵說 (religious symbolism)。他這樣判斷：

「杜威在他最近關於宗教問題的論著中，顯出同一說和象徵說的宗教思想。」(Ulrich, Fundamentals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P. 312) 可惜沒有更詳細的說明，指出他這樣判斷的根據。我們在杜威的共同信仰中所找到的，他所謂「宗教的態度」(religious attitude)，有以下幾個特點：

「宗教的態度，所引起人的經驗的改變，是廣泛的，深遠的；不限於任何一個情境或一種欲望，而普及於生命的全體。因為範圍廣，它的影響也就很永久。有了這樣全生命的調和完整，就不管以後環境怎樣變幻無常，我們可以安排，順

的遺產，一方面可以作自己寫生的輔助，更可以作創作的參考，因為一切學術的成就，都是歷代大家日積月累而成，不能離開歷史，離開社會而突然發生，所以寫字要臨帖，學畫要臨古畫，作文須讀古人的文章，做詩須熟讀世界的名作，一切學問，沒有既往，也就沒有進步，將來的進步，都是建築在既往的成就上面，不過我們要認清的是研究既往，是為開發未來，臨摹古畫，目的在自己創作，若是不然，只知崇拜古人，只知抱殘守闕，只知摹取古人的一部分，便感到滿足，那就變成故步自封，毫無進步可言了。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至於傳模移寫，乃畫家末事」，似乎很看不起臨摹故的方法，當然在收藏家，鑒賞家或大畫家看起來，「傳模移寫」乃畫家末事，但是在畫家學畫以及研究古畫的技巧時，却不能算是末事，而是很重要的工作了。古代模寫古畫的方法，大都均已失傳，因為多是師生口耳相傳，沒有文字的記載，就是有文字的記載，後人只看文字也看不懂。記載模寫方法最早的文字，還是看了看不起模寫的張彥遠，在他的歷代名畫記上，有兩篇文，第一是顧愷之的摹搨妙法，（註三）不過這篇文字在唐朝張彥遠時代，他已經說：「自古相傳脫錯，未將妙本勘校。」所以這一篇文字十分難懂，到現在更無法解決了，僅把那還可以勉強解釋的摘錄在下面：

「凡將摹者，皆當先尋此要，而後須以即事，凡吾所造諸畫，素幅皆廣二尺三寸；其素綠邪者不可用，久而還正則備容矣。」

素就是古人作畫的絹，用絹作畫須要先上頓，猶如刺繡的上頓相似，上頓時絹的絲紋務須平正，

若不平正，畫好下頓後，緣紋還正，則畫上的人物面孔反呈歪邪狀態了，

「以素畫素，當正養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頓使其動。」

將兩幅絹比齊，使它自正，不要勉強，並且壓住使它不動。

「其正筆在前運，而眼向前觀者，則新畫近我矣。可常使眼臨筆止，隔紙素一重，則所摹之本遠我耳，則一筆踏積踐繭小矣。可令新迹掩本迹而防其近內。」

舊畫在下，所摹之畫是新畫，隔了一層絹，畫起來大小不免有點出入，注意畫對於畫者的遠近，不可大意，否則往往摹畫比原畫為小。

「若輕物宜利其筆，重宜陳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畫山，迹利則想動，傷其所以疑。」

所畫的東西不同，用筆的方法也不同，後人作畫，通幅往往僅用一種筆法，所以表現不能充分，畫輕的東西，如行雲流水，宜用流利輕快的筆法；畫重的東西，如山石樹木，宜用堅凝頓挫的筆法。畫一隻光滑晶瑩的玻璃杯，絕不能和畫一塊凹凸粗糙的太湖石，用同一筆調。更不能畫玻璃杯的筆法去畫太湖石。光滑的一看是光滑的，粗糙的一看就像粗糙的，所謂「如以全其想」，就是如還它一個本來面目，把它的個性充分表現出來，所以畫山必用堅定的筆法，始有厚重偉大的氣象，如後代畫家所畫軟如棉，動如雲，堆如土，光如晶的山水，都不像真山。

「凡膠清及彩色，不可進素之上下也。」

畫時各種顏色及膠水等物，不可距畫太近，以免有所沾污。

受。這包含一點「屈服」(Submission)……但這屈服是欣然自願的，非被迫的。」(Dewey, A Common Faith, P. 16)

「宗教的態度，須有人與宇宙一體相融，——對它依賴而靠它扶持的感覺。」(Ibid, P. 53)

「任何活動只要是為着理想的普遍而永久的價值，不顧艱難，不避危害，去進行的，就都有宗教的品質。」(Ibid, P. 27)

杜威以為具體存在的這個那個宗教，並不一定有信仰上的共同；人類所能共同的，只是這樣一個宗教的態度。這態度的特徵，如果上引的幾點可以包括，那就是：一，它影響人格的永久組織；二，它引起人與宇宙一體的感覺；三，它支持我們追求理想的堅決行動。前兩點，的確是杜威所不常說到的。因為他一向只說經驗的變化歷程，不提經驗者的主體，——自我或人格；亞爾波(G. W. Allport)批評過他對人格的否定。因為他一向誇張人力改造自然，而不說人對宇宙依賴。羅素(Russell)稱之為「對宇宙的不虔」。

（“Cosmic impiety”）現在他也這樣說，似乎是趨向於拆衷主義了。可是他始終沒有越出經驗的範疇。他所說的宗教的態度，只是經驗的一個品質，如道德的或藝術的品質一樣，是任何活動所可具有的。這種態度的培養，當然也就在於一般教育活動之中，而不需特定的教義，或信條的崇奉。這與超經驗的宗教觀點，不知有多麼遠的距離。所以沃立最後還是「要求經驗主義檢討它自己的形上論的假定。」

「凡生人亡有手拂眼視而前亡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質對，生之用乖，傳神之遺失矣。」古代畫人物多有配景，很少一幅畫上只有一個人像，其他空無所有的，上面所舉的這些話，都是比較好懂的。摹寫的方法，不但為初學入門的必由途徑，且為複製前古名作的妙法，故歷代均很重視，至唐代還有官搨，可見其勢力之大。

我國畫家論畫，每喜高談闊論，冥想玄虛，以自鳴其高超，至於實際應用的方法，初學入門的規律，則無人肯言，即言之，亦多受人鄙視，甚且詆為工匠。所以古代繪畫方法，逐漸失傳，無可稽考，惜之以天縱奇才，獨肯以金針度人，殊為難得，所惜繼起無人，此種文字遂成絕無僅有的瑰寶了。

歷代名畫記所記工用搨寫云：

「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古時好搨畫，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筆蹤，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國朝內庫，翰林集賢院，搨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後，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寶之，既可希其真蹤，又得留為證驗。」

此篇僅講到用蠟搨寫的方法，因紙上敷蜡則透明可以透視原畫，古人習字，也多用這種方法。顧氏所言為畫者習畫之用，張氏所言為石跋流傳副本之用，所以他說：「既可希其真蹤，又得留為證驗。」這在西洋博物院及畫廊裏因為古代名畫難得，多用臨模的方法，臨模古大家的作品，以備觀覽。近代照相印刷術雖然十分發達，但是與原作相較，終究不能逼真，要想與原作逼真，只有另請畫家照式臨摹。

至於現在通行的臨摹方法，也有幾種：

(一)傳模 也叫摹搨，又名映臨，以前是用蠟紙，敷在原畫上照畫，現在為留稿用可以用拷白紙，為習畫用可以用絹，用薄的縲紙，先把大體的輪廓用淡墨鈎好，然後再將原畫置於一旁，細細照樣描寫，切不可用透水的生紙，以免滲污原畫，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

(二)移寫 就是通行的臨摹，也叫臨，又名仿，意即將他人的畫，移寫到自己的紙上，這種臨畫的方法，可以分三種：(甲)是對臨，將原畫掛在壁上，或置在几上，像臨帖一樣，照畫。(乙)是背臨，將原畫的格局內容，詳細研究觀察之後，用追想的方法背摹出來。(丙)是意臨，以前曾見過某畫，或會臨過某家而熟悉它的格局筆墨，再隨興之所至，畫出一幅似某家的畫，却不是固定的臨某一幅畫。初學應用對臨，稍進應用背臨，熟練以後，方可用意臨，對臨務求其像原畫，背臨只求大體不錯，意臨只求神情相似。

此外臨摹還可以分分臨與全臨二種，分臨就是僅臨原畫的一部分，全臨是將一幅畫完全都臨出來。又可分為(甲)縮小(乙)放大(丙)轉換三種。原畫很大，可以臨成小畫，按比例縮小；原畫很小(例如近代的照相，珂羅版畫冊等)可以照式放大若干倍；至於轉換也可以分為畫幅的轉換，橫的改成直的，或直的改成橫的；內容的轉換，左邊的樹撥

到右邊，前邊的房子搬到後邊。

臨摹的對象，當然以古今的名畫為最好，但名蹟可遇而不可求，則現代名畫家的作品亦可臨，且較臨古代作品之進度為速。再不得已始可求之玻璃版的印刷品，亦須求其筆墨清晰，印刷精良，審定確實者始可。至於石印木版等畫冊，既無濃淡，又失原畫精神，切不可用。這也有一種必然的步驟：

「臨摹古人，始乃惟恐不似，既乃惟恐太似，不似則未盡其法，太似則不為我法，法我相忘，平淡天真，所謂擯落筆跡，方窮至理。」——清方薰山靜居畫論。

似與不似是程度的問題，由不似而求似，由似而求不似，不似之似，是為神似，到了那個程度，不但「法我相忘」，而且「人我相忘」了。臨摹還是臨一家呢？還是諸家俱臨呢？這也是程度的問題。

「學畫者必須臨摹舊蹟，猶學文之必揣摩傳作，能於精神意象之間，如我意之所欲出，方為學之有獲。若但求其形似，何異抄襲前文以為己文也？其始也專以臨摹一家為主，其繼也則當編仿各家；更識得各家乃是一鼻孔出氣者，而後我之筆氣得與之相通。即我之所以成其為我者亦可於此而見。初則依門傍戶，後則自立門戶。如一北苑(註四)也，巨然(註五)宗之，米氏父子(註六)宗之，黃王倪吳(註七)皆宗之，宗一鼻祖而毫無隔礙之處，正其自立門戶而自成其所以為我也。」——清沈宗素芥舟學畫編

古今論畫的人，對於臨摹都是這種主張，總是以



為先臨一家，要臨得極像，一家既熟再臨他家，諸家既熟，須從事創作，要自立門戶，獨成一家，否則只作一家的信徒，成了古人的奴隸，縱然臨得唯肖唯妙，可以亂真，不過是變成複製品，印刷機，只有古人成法，沒有自我表現，在藝術上是沒有價值的，所以董其昌說：

「雲林畫法，大都椒木似管丘，寒林山石宗關全，（註八）兼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能變，便是離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由絕似耳。」——董其昌也說。

「法固要取於古人，然所資者，不可不求諸活潑之地。若死守舊本，終無出路。」——浦山論畫

現在要說到臨摹的弊端了，這可以分兩方面：第一種是假畫的充斥，因為古畫的價值連城，而且愈古愈貴，這情形在唐代已然。

「必也手揣畫軸，口定畫題，不惜泉貨，要購優者。則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華，孫尚子，關立本，吳道玄屏風一片，值金二萬，大者售一萬五千。其楊契丹，田僧亮，鄭法輪，乙僧，關立德，一屬值金一萬。」——歷代石畫記

唐朝人的畫在唐朝的價值，已經論萬金，比現在的物價，還貴了不知多少倍，因為利之所在，自然作偽的人就多起來了，假畫之多，在宋朝，已經算是洋洋大觀，所以米芾說：

「李成真見兩本，偽見三百本。」——畫史  
「世俗以蜀中畫懸網圖，劍門圖為王維真畫，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為王維。……其他貴侯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同上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神書藥肆，形似似爾，無自然皆凡俗。……成身身光祿丞……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

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為無字論。」——同上  
假畫之多，至足驚人，歷代都有作偽的專家，明代有一位張泰階自己造了一大批古畫，從三國時代的曹不興起以至六朝唐宋諸大家，無不應有盡有，而且家裏造了一幢寶繪樓，刻了一部寶繪錄，儼然以大收藏家自命，自欺欺人，大言不慚，一至於此！直到近代造假畫的人還是層出不窮，以前以揚州，蘇州，北平，現在的上海，都是造假畫的大本營。而某某大畫家也正是造假畫的好手。不但古畫有人造，就是今畫也有人造，只要能賣錢的畫，就有人造，並且造了假畫公然的開展覽會，居然也能售賣一空。

假畫好壞的程度也至不一律，有與真蹟毫厘不爽，真偽並列，也不易辨別的。米芾就是造好假畫的代表。他「能以古為今，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搨，搨竟，並以真贋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可認識。」假畫最可怕與真畫並列，但是造得好處，竟可以超過真畫。因為這種造畫的人，他本身就是一個大畫家，本領未必下於古人，自然造出來與描頭畫腳的俗工不同。造假畫的困難之處很多，不但是畫，至於紙，絹，題跋，印章，裝裱，籤軸，種種東西都要造的像舊的。宋絹元絹明絹清絹都有不同，宋紙元紙明紙清紙亦各有不同，圖章固然不同，印色也以時代而不同。各家的字體各有特色，假字比假畫更難，所以要想造一幅古色古香，無疵可指，使鑒賞家認為真迹神品的畫，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許多不好的假畫，何以也能流行，被人所珍視呢？這是因為收藏家鑒賞家的眼光不同，識力不同，嗜好不同，甚而至於毫無知識，附庸風雅，或只圖誇示富有

，就以耳代目，人云亦云的被骨董掮客所欺以燕石為荆璞，以優孟作孫叔敖，而假畫也就永遠有銷路，造假畫的人永遠不致沒飯吃，這種殊病固由臨摹而來，但對於畫風的影響還小，其影響最大的是畫風的不振。

繪畫本係以創作為最高目標，以臨摹為學習的手段；摹擬古畫本係作技法的研究，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並非以效似古畫就算滿足，畫家本應以寫生為基本，以臨摹為輔助，以造化為師，以古人為友。但創作是一種很困難的事，非有偉大天才的人莫辦，寫生也是一種不容易的事，至於臨摹自較創作為省事，較寫生為便當，好逸惡勞，人之天性，舍難就易，勢所必然。唐宋時代的畫家，多係寫生，富於創作的能力，各自成家，勢不相下，所以能形成「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的盛況。元明而後，畫家力崇復古，以臨摹古人，肖似古畫為能事，寢假而不知創作，不知寫生，以為畫法之中只有「傳模移寫」的一法，唐人認為「畫家末事」的，後人反認為畫家正事。尤其到了明末清初，董其昌，王時敏，王鑑，王原祁，王翬諸大家，都以臨摹為不二法門，而王時敏王鑑王原祁所臨的範圍日狹，甚且終身只模黃子久一家，當時因為環境地位的關係，登高一呼，響應四起，於是畫壇成了一種風氣。黃子久的畫法本已平淡刻板，沒有甚麼氣勢和變化，學他的人自然日趨呆板薄弱，千篇一律毫無變化。究竟黃子久的畫也沒有幾張，並非學畫的人隨時都可看到，於是只好臨三王所臨的黃子久，輾轉相臨，去黃子久愈遠。

「夫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固矣。賢人之言，庸人

# 論修史工作中之「記注」與「撰述」

王蔭鐸

修史工作，方式良多，就各種類紛雜之史料，加以整輯排比，以爲史著之初步，曰比次之業，由比次之業，運用史法史學之概念，進一步勸成，曰撰述，而比類在史學之價值，對撰述而言，仍爲史料，不過係有系統之史料而已，此外尙有直接攝取當時當地事象而成之記錄，此則爲記注，記注爲一種有系統之記載，此亦爲撰述之按據。

修史最高之境界爲撰述之業，其先步形式爲史纂，而記注亦復爲其資糧之中堅，爲構成撰述必憑比類記注等史料總體以備取材，爲發展史學，爲便利修史，對於記注成法與比類之業，不可不留心注意。關於比類之編纂已詳拙作「文獻編纂法初步」一文（載安徽文獻第四卷四期）。茲進而論記注之本質及其達到撰述之過程，藉供修撰史志者之參攷。

## 一、記注與撰述之區別及其關係

記注一辭，應用於史學，助於清章學誠先生，（註一）實以記注與撰述對舉，認爲係史籍之兩大類型，且不憚反復闡明二者之精義及其相互關係：

一則謂：「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問皆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藏往欲其該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註二）此段闡明記注撰述之本質，無任詳備。其內容在說明一、撰述之目的在達到圓神，其用爲知來，記注之目的在達到方智，其用爲藏往，二、記注之妙用，須能使人對往事不忘，撰述端在使來者可以興起，三、記注旨在該備無遺，其體一定，撰述則須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綜觀上述，其彼此間之本質大明，然達到章氏所列舉之境界，則所謂撰述者，必須應用正確之歷史觀，妙用史法別裁方能抉擇去取，例不拘常，得以恣其縱橫變化也。

次則以記注與比類之業，性質相做而與令史孔目相勸；章氏之言曰：「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自漢以來，學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現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尙考索之功，天下之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晷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則備稽檢而供採擇，初無他奇也」。（註三）

述之而誤矣。一舉再舉，瘦者漸肥，曲者已直，事至數十通，全非本來面目。」第一桂小山畫譜

結果是「家家大癡」「人人一峯」，「一幅幅子久」，（註九）不但沒有一幅真像黃子久的，就是畫的能以亂真，也不過是一幅假畫，也不過是些印刷品，在藝術上又有甚麼價值呢？因此清代三百年的畫壇，雖然有不少的畫家，大多數都是陳陳相因，亦步亦趨，毫無創作，毫無生氣的作家，其中能以獨出手眼，不肯隨波逐流的，實在得少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因爲沒有寫生，只有因襲，則畫法上日漸陳腐退化。沒有創作，只有臨摹，則畫風上日漸萎靡不振，因此造成了中國畫壇空前的衰運。這種流風餘毒，到現在還保存了相當勢力，一時還不容易剷除。近年來雖經三數同志，大聲急呼，努力提倡寫生，但是積重難返，一般畫家仍不免以臨摹爲能事，不過風氣已漸有轉機，曉得寫生，注意寫生的人，漸漸多了，畫風自然就可漸漸轉變了。

（註一）謝肇淛五雜俎曰：「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此數者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不過謂繪人物花鳥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概施於今，何嘗柄鑿？」第一桂小山畫譜曰：「愚謂即以六法言，亦當以經營爲第一，用筆次之，數彩又次之，傳模應不在畫內，而氣韻則畫成後得之，一舉筆即謀氣韻，從何著手？以氣韻爲第一者，乃實經家言，非作家言也。」

（註二）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論氣韻非師中語。

（註三）按名畫記引錄顏愷之文字有三篇，一曰論畫，二曰魏晉勝流畫贊，三曰畫雲臺山記。其論畫一篇即係魏晉勝流畫贊，而魏晉勝流畫贊一篇實係摹擬妙法，不知當時何以弄錯。（下接十九頁）

三則以撰述在史學上之價值，優于記注；章氏言曰：「夫合甘辛而致味，通彙組以成文，低昂時代，衡鑿士風，論世之學也，同時比德，附出均編，類次之法也，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諷而實惜，予奪之權也，或反證若比，或遙引如興，一事互為詳略，異撰忽爾同編，品節之理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聚公私之記載，參百家之短長，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觀者興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註四）以章氏之意，歷史之撰述，須備類次論世予奪品節諸義，記注既與令史孔目相勦，其格自低。

四則曰記注為撰述之憑藉，則為記注之業者，貴知撰述之意。章氏謂：「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則備稽檢而供采擇。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註五）又曰：「但為記注之業者，必知撰述之意，所次之材，應使撰述者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記注與撰述者，各有淵源，不可以比次之密，而笑撰述之或有所疏，比次之整齊而笑撰述之有所畸輕畸重。蓋撰述有如韓信用兵，而記注有如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不可為良也。」（註六）

信乎章氏之言，夷考我國歷代史書之撰述，其主要資據，乃為記注，司馬遷撰述史記，採擇古記注甚弘，洎唐宋以後歷代修撰正史，尤惟記注是賴，如明徐一夔論宋史有云：「近世論史者，莫過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據也。自唐長壽中，

史官姚璠請撰時政記，元和中章執誼又奏撰日曆，日曆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意，至於起居注之說，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諸司必關白，又詔詰則三省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司必報，百官之進退，刑賞之予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問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啓事，中外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無不隨日以錄，猶患其出於吏牘或有謬失，故歐陽修奏請宰相監修於歲終檢點修撰官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如此則日曆不至謬失，他時會要之修取於此，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宋史之所以為精確也。」（註七）此即一例證，但記注為素樸之記錄，撰述為嚴格之史著，夫撰述必根據正確之歷史觀及精妙之史法以攝取史事，但記注則否故言記注之業，但期詳審賅備，俾資按據，並未可以史法及史學嚴繩，此其分野之章明較著者也。

## 二、我國記注成法

歷史為人類活動之蹟，屬于生活範圍，史學為研究此種結果，屬于知識範圍，介歷史與史學之間者為記錄。但史學之發生成長，記錄實為其第一步工夫，我國記錄之術，起源甚早，殷商以來，即有專人司記錄之業，初不過對日常軍國大事撰要記錄籍誌勿忘而已。然未知撰述，如載籍所記，古代史官甚多，能史之古義亦即象手持中之記錄，茲不贅列，容為文另論，其記注事實之具體者，如禮玉藻所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例若晉董狐之書趙盾弑君，北史氏三書崔杼之弑，秦趙二主會於澠池，各御史書鼓瑟鼓缶，均為其明徵也。（註八）其初形，殆為指辭極簡單之年歷語彙，而此種年歷語彙之記錄者，則係史官，此種素樸之記錄，浸假發展為史學，我國春秋以前，此種形式之記載甚盛。（註九）並無系統之書出現。迨孔子觀書周室，因會史記而作春秋，即根據當時記注剪裁刪定撰成，是為撰述之始，其後司馬遷著史記，書史陸續發現，所以在古日只有記注而無撰述，故章氏有言：「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也。」（註十）秦漢以後，私家撰述之風盛，而記注之法雖衰，但如起居注時政記日曆之類，相沿不絕，仍存古記注之格，所謂起居注，即左史所記時君言動之書，時政記即宰執朝夕議政時君臣奏對之語，日曆即據起居注時政記潤色而成之載記，此數者，實章氏所謂記注之書。起居注制，似始于漢，前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註十一）（見風俗通）劉毅上書謂：「漢之舊典，世有記注。」唐宋起居設有起居即舍人日立天子仗前，記其言動，謂之起居注，唐宋迄清，起居設官，相沿不絕。至時政記始於唐，武后長壽中，鑒于起居注對仗下謾議，不得與聞，乃由宰相自撰時政記，以彌其缺，月屬一草，彙送史館，是為時政記之始，五代以來，中書樞密並皆撰記，宋時政記由中書樞密錄送史館。元時于中書省置時政科以左司郎中掌之，以事付史館，明以來時政記之制，不復相沿，日曆一體始自唐憲宗元和中，時章執誼

爲相，請修撰官各爲日曆，至月終于館中會閱，議定是非，大體取材于起居注與時政記而潤色爲之，宋命著作郎專撰日曆，祕書，省有日曆所置起居佐郎以掌之，元明以來，此制亦廢，此種起居注日曆時政記皆爲歷代修正史之憑藉，如劉知幾謂：「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莫不稱之以成功」，（註十二）即其一例也。晚近編纂年鑑及大事記之風頗熾，此亦可視爲記注之繼續，如商務印書館之中國年鑑，申報館之申報年鑑，武漢日報社之武漢日報年鑑，國民政府之國府年鑑以及各省政廳之各省年鑑，此外實業年鑑財政年鑑金融年鑑勞動年鑑教育年鑑美術年鑑等種類甚多（註十三）而呈不規則的發展，以一年爲斷限；或包舉一地城之各種活動，或類次各種專門事業之設施，無論其動態靜態制度文物，盡納之于中，詳略無遺，蒐集事實甚豐，對撰述歷史而言，誠爲至佳之史料，洵爲修史者之採擇之資源，故近來爲一般修史機構所注意，諸如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國民黨年鑑，上海市通志館及文獻委員會出版上海市年鑑，安徽省文獻委員會編纂安徽年鑑，以及廣西桂林文獻委員會最近亦有編纂年鑑之舉，蓬勃之象，有如雨後春筍，信以年鑑在歷史上功用至大，近人黎錦熙有評：「年鑑必發軔于地方，而後綜合于全國，參加于世界，則繁簡詳略，皆能不失其正確性，」其言亦復中肯。（註十四）至於大事記按日摘取時事，分類記錄，舉凡天象人文如氣象溫度以及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各項活動，無不畢書，其發生于一時，綜合而爲斷代，

發展爲通史，日就月將，詳審得要，則整個歷史過程，於焉顯現。其既隨時事實經過，無遺無漏，及時記錄，則後來修史者自免文獻無徵之憾，此其存備記注之用，而于歷史之撰述，爲用非淺。按此種素樸載記，其特徵：一在據事直書，並無後世所謂以歷史方法攝取者，二其事皆由專人世守，經常記錄，依據一定成法撰記而不加撰述，故章氏贊之卦德，其目的主詳備，及爲修史之考鏡而資取舍，其本質雖亦爲史料，但與其他一般史料差異，蓋史料範圍甚廣，有的資料或發于他種目的而致用于修史，（註十五）並非爲修史而作，惟記注載錄具有法度，攝取事實具有意義，其目的專爲存史而作，乃爲有系統之史料整體，非同散漫零碎可比。其次史料如檔案紀念物品報刊等等，其原並非爲修史而作，往往不免浮誇誣失之虞，其用僅可備參稽，記注則及時及地據事直書，爲親見親聞專爲歷史之記錄，而非傳聞或宣傳及追述之作品，可視爲原始史料，其價值至大。三此種事業經常持久，往往使史事之發展有其精確真實之留痕，至足顯歷史之功，倘記注之業，因學術進步得爲人人注意，而普遍盛行，他日撰史，能普遍蒐集各時代各地方各機關之記注書，以備大規模之採摘，其于史學發展，當非言語可喻，故章學誠謂記注爲撰述之按據，而譬如蕭何之轉餉與韓信之用兵，誠以其爲歷史產生之資源，而爲史學之基礎。

### 二、撰述之過程

記注以記載史事爲任，其要僅在詳審該備爲已足，但歷史之最高境界，不第記述史事，且有

兼司闡明史事之任，故于記錄之外，必研究社會變革，探索變革中之人生及其產物之文化，而有察變探源求例知來之價值，其達成此種境界之史籍，是則曰撰述，撰述以具有圓神之體，而舍知來之用爲尚，因此史家之修史，雖以記注爲始功，而畢竟以撰述爲終事，夫修史之務資于記注，發于比類，成于撰述，信爲歷史編修工作之各種步驟。但是由記注比類以達到撰述階段，頗爲複雜，必須應用卓越之史才史識與精深廣博之史學，及純正之史德始差可利其事，其過程大抵或爲刪定，或用鈎玄。所謂刪定之功者，即先有極豐富之史料，然後加以細刪細芟，去其繁蕪，使成精核之作，此即由博反約之道，如司馬光之修資治通鑑，先成草卷，次第刪定，即爲一例。次曰鈎玄，即根據某種歷史觀點，直接攝取必要之史料，其要領即基于史家對歷史事實懷一種新看法，務將記注或一般史料，依此種法則羅列提要鈎玄，以表顯其意義，務使舊聞隨新證而改觀，史事得新見而愈確，反覆推證，筆之于書，如近代諸史家或以唯物史觀或以文化史觀，或以民族史觀所著之史，皆屬鈎玄之功，蓋皆基于利用某種歷史方法論，直接攝取史事去取史料也。此二種途徑（註十六）均爲由記注以至撰述，由無系統之史料，達到有系統著述之階梯。其工作微有不同之處，即在選擇史料一端，刪定乃係先無目的廣泛編比史料，然後選擇去取，（註十七）鈎玄開始即以選擇之態度去攝取史事史料，（註十八）因此由刪定之功，以達到撰述。往往經過此類之中間階段，而鈎玄之功，則簡單而散漫之摘記，直接成就。

撰述過程，既在刪定鉤玄，其重要工作即選擇史事及組織史事；因記注比類，備做到刊落訛誤，免除重複之境地，而輕重煩瑣之間，並無權衡，然則浩繁史事，勢不能完全寫出，其何所據而查刪交勘定，茫茫史實勢不能完全包容，何所別擇而得鉤其玄，是則以據刪定鉤玄者，一即考證著作中應述何種事跡，二則考慮如何敘述此種事跡。前者須應用歷史哲學以別擇史實，後者不得不運用史法以構成規矩，此為史家最重要工作，尤為良史之關鍵，撰述最緊要處也。（著作中應述事跡及如何敘述事跡之研究工作，為篇幅所限，容另文詳述。）

然撰述之製作，期能先事了然于時代民族演進之全貌，而後方易據此以決定史事孰輕孰重，孰去孰取。但此種工作必俟時代結局已成事實，演進之蹟已告一段落，始可着筆，故撰述之任，往往有待後來，俾事實之結局完成，方可使史家對於所述之時代了解無遺，然後所用史事，方能切合全部結局，故為人作傳，貴在身後，以其一切已成定型也。他如為一時代作史，貴于一時代發展到成熟階段後勘定，志一事象，必其事象結束時抒成，其義不外期對其人其事其時代得一真確固定之全貌，否則史實正在發展，而妄加撰述，則其成就之大小，殊難臆然，而所得結果，亦終不能顯其結局，如撰此次我國抗日史，必于戰事結束勝利復員以後，執筆抒寫，才能得其典要與夫全部經歷，庶輝煌抗戰之蹟，及其所以勝利之故，與其間社會變遷之情況，自可粲然具舉也。

雖然撰述之業，須于史實之結局顯然以後造

作，但記注之業，須經常不斷進行，如撰述人傳，必其身後較為適當，但其人之起居行事，尚可日記年譜隨時記錄（註十九）紀傳為撰述，日記年譜為記注，但撰述人傳，而日記或年譜實為撰述之良材也。

由是觀之，當今歷史工作，莫如廣泛恢復古記注之法，修史機構既由臨時性而變為經常性，宜于平時蒐集史料，並致力於記注比類史考諸業，適時彙記注比類以撰史志，（註二十）自易釋功就事，真確逾恆，竊以現時風行之年鑑，隨所見聞，按月為一冊，以當往代之起居注及日曆，年鑑取當時政事典章分類編纂，年次一回，以當往日之時政記或實錄，同時整理其他史料隨時加以比次，以一事之首尾完具者，即勒一專冊，而成許多史料彙編史料專篇，（註二十一）他日作史，苟能彙各專門事業歷年記注，則專史易成，彙各地方團體歷年記注，而國史易就。推而言之，或發軔于一地方一時期，及其積累及于全國，以至參加于世界，而人類全史亦易就也。

不過古記注之法，固宜恢復，但古今記注之內容，必須區別，非如起居專注以記帝王言動為職，時政記專以記百官僚屬之談議為限，其範圍僅拘于政治之一面而已，無怪古日修史以如此之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取裁，雖號為大著作，終不免于帝王家譜之譏。

所謂現代記注，除記錄官方之動態外，兼詳民間之事蹟，于政治之活動外，須遍及于社會經濟軍事文化諸端，並旁探天象地理之變遷而于人事有影響者。以視古代記注，其範圍益擴充之，內容務博，（註二十二）而適于時代要求。

總之修史工作步驟甚多，循序而前，不容躐等，其取材必藉當時之記錄，而勒成著作，則在史家之別裁，故撰述之先步，資據于記注而以比類為準備斯為正途，近人修談撰述而忽視記注，厭于撰述之先廣資記注勒編比類以為初步手續，輒以高明獨斷之學憑其觀察以攝取史事組織成篇，樂於輕便而憚于煩重，用力少而取材疏，故成書易，內容簡說明多於事實，解釋偏而不全，以致歷史派別分歧，著作鮮衷一是，（註二十三）歷史學雖已進化然數十年間迄無盡滿人意之鉅大歷史書出現非偶然也。六月二十八日脫稿於合肥安徽省文獻委員會

註一、先於章氏，有劉知幾鄭樵二家，亦曾論及。知幾謂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後來經始者，貴乎簡識通才。必論其事實先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鄭樵則謂有史有書。一學者不辨史書，史者官籍也，書者書生之所作也。自司馬以來凡作史者皆是，書不是史。劉氏所謂當時之簡，與鄭所云書皆屬撰述。謂後來之筆，與鄭所云書皆屬撰述。

註二、文史通義書教下。

註三、章氏答客問。

註四、和州志列傳總論。

註五、章氏答客問。

註六、章氏報黃大職書。

註七、明文苑傳及朱彝尊曝書亭集徐慶傳。

註八、左傳及史通史官建國篇。

註九、如古代各國之春秋書志皆形似賬簿式之記錄。又玉海四十八條引隋志云程天子傳與今起居注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下接第二十一頁）

# 論讀書與治學

程宗潮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又說：「溫故而知新。」學便是「知新，」習便是「溫故。」從現代心理學上解釋，學是新經驗之獲得，習是舊經驗之保持。學習便是人類行為和思想之改變，也可說是經驗之繼續改造。「活到老學到老，」祇要是生活着，祇要是能從這時刻轉變的環境中生活着，便無時無地不在學，學的範圍是多麼廣大。這裏談治學却指有目的的學習而言。有目的的學習，便須注意到學的資料與學的時間精力的經濟；更須談一談治學和做人的方法。

## 一、先談讀書

人類經驗的累積，不僅是個人的，而實是民族的社會的。這種經驗的結晶，是文化，是學術思想，是一般的生活方式。文字發明與書籍記載的進步，對於這些文化的保存傳播，有莫大的功績。文字發明之初，至爲笨拙。夏殷之甲骨文與鐘鼎，不能說是書籍。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可知此時始有用竹簡編成的籍。秦漢時始多以筆書於紙帛成卷之書。然伏生傳尚書全憑口授。王國維流沙墮簡謂漢代木椽係以一方木之兩頂角，斜削而成。師古注史游急就篇，亦謂「舩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古人常以筆沾漆書於竹木之版，有錯則以刀削之，故稱刀筆。書籍流傳，全憑抄寫。斷簡殘篇，錯誤脫落，在所不免。漢熹平以後太學門前列石經，視爲鑄定本，以供學者抄錄。殘唐五代始從碑拓方法中，發明印刷術。書籍流傳，漸見廣被。歐洲十五世紀以後，文藝復興，科學發現，亦與印刷術之發明，（一四二三年以後）有密切關係；從而衍成今日燦爛之西方文化。可知讀書實爲簡捷的治學方法。

書籍流傳泛濫，種類亦繁。真是汗牛充棟，琳瑯滿目，一個人窮畢生之力，萬不能全加涉獵。古人「皓首窮經，」這種「死讀書讀書死」的呆氣，實亦無可取法。讀書應有選擇，應就其與個人有關問題之書，加以抉擇。且應分別何者應精讀，何者應略讀。精讀者應細心研討，略讀者略識大意

而已。太史公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精神先生難言之。」秦火以後，漢代求遺書令獻古書者有獎；以至民間有以偽書圖財，抑或將古書加增篇幅者。近人著作中，更真偽雜出，議論紛紜者。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莊子論讀書，認「所讀者乃古人之糟粕。」盧騷也說：「我們最基本的哲學教師是我們的手眼和脚。用書本教兒童不是教他想，而是教他用旁人的思想。是教他信從或盲從，而不是教他真知。」裴斯比拉齊主張，少讀書，多發現事實，而且能證實一切事實。「誠然書籍記載，祇是前人或其他人經驗的一部分。這中間還有許多「不可傳」者在。還有許多真理，要待我們去探討，去發現。因此讀書就個人說雖可得到新知，但就學術內容說，因祇限於民族舊經驗的保存，還祇能算是一種溫故。所以讀書雖可經濟時間與精力，爲治學之重要方法，但不能視爲治學的唯一方法。」

## 二、次論治學

讀史的人都知道孔子刪詩書，經籍之傳述與整理，對於春秋以後學術思想之發展有密切之關係。卽歷代經籍之疏註編纂，亦與東方文化之保存延續有不可磨滅之功績。但整理國故不能算盡治學之能事。我們讀西洋史時也深信希臘典籍之發現整理，有同樣的偉大功績。十七世紀以前，亞里士多德之書；視爲哲學，形而上學，心理政治倫理等學，以及自然科學包括天文氣象物理生理等，科學上之唯一權威。同樣的格倫（Galien）醫學解剖學；托來米（Ptolemy）之天文學，（天體運行一書Mechanism of Heavens）亦多奉爲天經地義。但自哥白尼（Copernicus）發現天體運行現象創地與行星繞日移轉之說；耆勒（Kepler）更加以證實，用三個簡單數學公式解釋星體運行。格來魯（Galileo）於一六一一年用望遠鏡發現行星移動。博爾（Robert Boyle）與托留西（Torricelli）發明氣壓原理。哈威（Harvey）發明血液循環說。五百年來學者的努力，對於這些古人的糟粕，大刀闊斧，實在廓清不少。最有趣味的，是一五八九年格來魯在波羅

(Pisa)斜塔上的公開試驗：打破了亞里士多德重物下墮速於輕物之謬見，證實了物體下墮除氣壓關係外速率應該相等。當一六一六年格來魯為教會視為離經叛道之邪說而被捕審訊不得不自認錯誤。他低着頭出門時，低聲自語道：「真的終歸是真的，不能因我承認錯了，便成了假的。」誠然「發現真理」才算是治學的主要目標，讀書不過是獲得一些意見與資料而已。

### 三、所謂治學方法

近人治學既然要從真理的應用進到了真理的發現，自然他的方法也就從演繹的進到了歸納的。歸納方法有人說是一種重視自然現象的科學方法。培根(F. Bacon)在思想上的貢獻，這一點是較亞里士多德的思維方法進步得多了。其實培根並不是一位科學家，在科學上沒有什麼發明。他批評哥白尼格來魯等的意見，也十分幼稚。赫胥黎(Huxley)在他那本方法與結果書中(Methods and Results)第二章「科學之進程」提到了這一點。他說「用尋常人的知識，掃羅事實即可得一發明科學之路。(via inveniendi scientias)且可提高人的聰穎，而不涉及其先天智慧，所謂天才者，實屬培根的夢想。事實上培根之路實無能行之望。而且根據不完全之歸納，依先知先見之假設，為培根所最反對者，却證實為最有成效。此種假設實有科學進程中必不可少之工具。」實驗主義的哲學家，更重視此點。他們簡直把真理看成一種有成效的假設，一種用以解答問題的工具。牛頓(Newton)先有了一種地心吸力的假設，一六〇六年測量月球每秒鐘離開軌道之切線為一三英尺，而依其公式計算則應為一五公尺。俟至一六七九年發現計算時地球直徑有錯誤加以改正，始恰相符。又如哈威一六二八年反對格倫之血液吸收說而假定一種血液循環說，亦待至一六六一年麥勃葛(Malpighi)用大顯微鏡發現微血管後始更加證實。科學家從不完全的事實，構成未證實之假定，以求得證實之真理，數見不鮮。所以菲威爾(Whitwell)論考白勒之科學工作時，說：「科學家應有勇敢自由的付測，與審慎緻密的證明。」(見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 vol. 1-p. 29)這種付測與證明，實屬治學方法不可少的步驟。

因此我們相信讀書可以得到許多資料。宇宙的事物，耳所聞，目所睹，五官四肢所接觸，更可以獲得重要的資料。但我們還要「得聞」。我們

要能從各書的記載比較校離中發現疑問；更要能從客觀的宇宙現象與書籍記載的比較，慎思明辨中發現疑問。牛頓能從蘋果墮地中悟出地心吸力，格來魯能從教堂懸燈的擺動中悟出擺的定律，清代漢學家也能從讀書中校正古籍的謬誤，通常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習而不察的地方，都是天才的科學家發現真理的端倪。又如近人比較老子一書與同時代的著作，以及史記老莊列傳中「或云在孔子時或云在其後」一語，懷疑老子是否為孔子問禮於老聃的老聃所作。能發生疑問才能「得聞」。這種「得聞」工夫極需要個人的學養與才力；至於進一步的勇敢付測與證實，更非有學養與才力以及孜孜不倦的精神不可。還必得如莊子所說「庖丁解牛目無全牛」的工夫，然後才能「以無厚入有間」。雖然一個人的才智與穎悟是先天的；但是學養則可從實際經驗的體味與多讀書的領會中得來。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穎異的灼見，常能產生滋長於博學的園地。我們要讀書，要從勤學上做工夫，便是為此。

### 四、治學與做人

我們論治學，目的在求真。姑無論真理是否祇是一種工具，一種心的境界，還是另有客觀的實在。這些哲學上的問題，暫且擱置不談。我們的智慧，不僅是「從天而頌」，實在是為了「制天而用」。我們為學，歸根到底，離不了人生；活到老，學到老。所以治學的方法，實在也就是做人的方法。「學者，學為人而已。」宋儒的「學為人」，雖則多少帶一些道學氣。可是人生實在無時無地不在應付疑難問題與境况。許多事業家雖或讀書很少或無暇讀書。但他們的努力奮鬥，以至於成功；確亦無時不在運用他的經驗與才智，從客觀的事實中，搜尋一可以解決疑難應付境况的假設；孜孜不倦以求達到他的目的；與上述科學家創造發明的方法相吻合。一個人成就的大小，要看他所找着問題的大小，是限於個人的，或關於社會國家的，或是涉及全人類幸福的。偉大的先哲與烈士，常常犧牲個人，也祇是為此纔可以促進社會或人類的幸福，達到一種心安理得的境界。一切真理的發現，究都不能出此範圍以外。讀書可以增加一個人的經驗與學養，也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態度。宇宙的生生不息，一切是在這生命的洪流中生長與發展。了解治學便可以知道做人，更可以明白人生的真義了。

# 歷史與求真精神

錢君暉

## 一、假與真

在人類社會活動的現象中，古往今來，遷變無已，無論其演進情況如何，在人們的記憶之中，總不外有真與假的二途。

歷史是人類社會活動的記錄，在活動的本質上，自然沒有真與假的分別；但在這種活動的記錄中，就往往會發生真與假的問題。能夠說明活動的當時和此地的實在情況，就是歷史的「真」，否則就是「不真」——假——因為記錄的本身有所欠缺，引起我們對於這種活動的本質發生懷疑，因而牽連到歷史事實真偽有無的問題，聚訟不已，成為史學界多年來不能解決的紛爭，但也因此促成今日史學界的發展與進步。

歷史的演進是真實的，不會成為虛偽；因為這是事實，自然不能有所偽造。但是為了記錄的不盡可靠，就發生兩個問題：第一是歷史本身的真偽有無。第二是記錄歷史事實的史料有無偽造。

人類歷史至少要有幾千年的過程，因為年代的久遠，今日我們所能見到的史料，愈古的愈少。史料是已往人類思想行為所遺留下的陳跡，既然愈古的史料愈少，所以愈古的歷史，其真確性也愈小，歷史的真實成分與年代的遠近成了相反的比例。因為史料的不盡完備，遂有人錯誤歷史的本質，給人以偽造史料的機會，因而史料發生了真偽的問題，對於歷史的本身也形成可靠與不可靠的兩種認識。

真的歷史可使我們和生在前的人同住，而且住在我們沒有見過或到過的地方。不但可以得到一種豐富現實的人類知識，並且可以得到許多人千百年來所積累的寶貴的經驗。

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所見到的是假的歷史，是偽造的歷史，而我們仍就信賴牠，那末，我們是被欺騙了，這種損失的重大，是無可比擬的。

我們不能信賴假的歷史，我們要尋求真的歷史！

## 二、歷史爲什麼多偽說

歷史的本身，沒有真偽的分別，但是後人見到前人所遺留下來的歷史材料的時候，史料就有真偽的不同了。一件歷史事實的發生，在當時當地參與其事的人的記載或遺物，自然是真確而有價值的材料，但是事實上這種材料，後人極不易尋到，既不能尋到原來的材料，祇好降格以求其次，這

## 評姚枏譯註緬甸史

劉仁成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壹元六角。

英人哈威著之緬甸史，已由姚枏先生譯爲中文。第一冊，第二冊，業已出版。第三冊是否出版，不得而知。姚先生是南洋史專家，對緬甸史造詣甚深，所以他翻譯這本書，實在是再好不過。他的譯文亦確實稱得起「信達雅」三字。在國內學術界說起來，實在是一本很好的緬甸史參考書。可是任何一本好書，都免不了有不少的錯誤！現在我們就將第一冊中，幾個問題，討論一下。還得請姚先生多賜指教！

第一冊第八頁稱：「迨八〇〇——二年驃國會兩次遣使，入朝中國。第二次且以王子舒難陀爲使，隨南沼使至京師，獻其國樂，並作梵歌曼舞，合爲「南沼奉聖樂。」我們看了上文，就覺得在兩三年期間，向中國進貢兩次，實在是可懷疑的一個問題。我們再看看唐書，如何記載這件事情？由他們的不同點，或許能得到一個滿意的答覆：

唐書音樂志：「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章舉以進。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本國樂。」

唐書驃國列傳：「貞元中其王聞南沼異牟尋歸附，心慕之。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沼重澤來朝，又獻其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俱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意。尋以悉利移爲試太僕卿。」



樣便發生了史料的偽造和訛誤的問題。

歷史爲什麼多偽造？至少要有下列幾項原因：

- 一、事實上的困難——古代史料多已泯滅而不可考，其能遺存到今日的真實史料，又非常稀少，以少量的史料而推究古史的全貌，自然容易發生錯誤。
- 二、故意的偽造——自古以來偽造的史料屢見不鮮，其偽造的原因：或因人們崇古好古和信古的心理而事事託古；或因有人懷抱壟斷學術思想的野心；或爲政治的競爭而篡改古籍，偽造史實；或因學者商賈爲投機圖利而偽造史料。總之，故意的偽造，往往能以假亂真，這是歷史偽造的最重要的部份。
- 三、錯誤的推想——因爲學者的疏忽淺見或錯覺，不明瞭史實演進的狀況，對於現有史料，發生誤解——文字的或實體的——遂以自己的意思推測或幻想歷史的情況，往往謬誤不實，把真的歷史解釋成了假的歷史；或者誤探虛偽史料，使歷史失掉了牠的真相。

爲了以上種種原因，歷史就會失掉了真實。但是，爲明瞭人類社會活動的實況，我們必須尋求歷史的本真。

### 三、怎樣尋求歷史的本真

歷史的本真既是我們尋求的重要目標，那末，怎樣的尋求其本真呢？

歷史的本身發展是科學的而非哲學的，因爲歷史現象是單一的，不會將同樣事實在不同的時空使其復現，所以歷史是不能用以垂訓後世。歷史是事實而非哲理，所以歷史與文學哲學不能並列在一起。但是，因爲歷史的範圍包容廣大，所以任何學科都會與歷史發生聯繫作用，研習歷史的人，總應具備一切人生常識的基礎，而後再去尋求歷史的本真。

歷史既是科學，那末，欲求歷史的本真，自然應該利用科學的方法。所謂方法 (Method) 是人們爲達到某種目的的一種確定有組織有系統的活動途徑 (或手段)。研究學術也應有其法則，所謂科學方法，至少要能將研究的材料隨時予以分解，整理或復原的幾項工作與效果。在歷史方面所應用的科學方法，至少要注重到直觀與實證的兩種原則。

一切歷史材料，當以親身經歷或親自目睹的爲最可靠，即不經推理歷程而直接領略事物的意義或內容，也就是現代法國學者柏哥森氏 (Henri Bergson) 所謂「無知之知」或「純粹知覺」即歷史的直觀 (Historical Intuition)。所謂實證，在歷史方面的應用極廣，一切史料因爲真偽的不同，必須有方法，有證據以證明其真實而後才能應用，也就是法哲孔德 (Auguste Comte) 所謂「吾人所能認識的限於事物的現象，由觀察及實驗，綜合諸現象，推斷其因果關係，而明其法則」。即歷史的實證 (Historical Positivism)。

根據唐書的記載，驃國向中國進貢兩次：一在貞元十八年，即西元八〇二年；一在貞元八年，即西元七九二年。

新唐書禮樂志：「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詣劍南西川節度使章舉，欲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舉乃作南詔奉聖樂……十七年驃國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章舉復譜次其聲，又圖其舞容樂器以獻」。

新唐書驃國列傳：「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章舉，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舉作南詔奉聖樂……」。又同傳：「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章舉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

由新唐書可知驃國進樂，在貞元十七年。驃國使臣舒難陀於是年至成都。何時至京師，則語焉不詳。

由以上三種材料，比較的結果，就可知道在貞元中，驃國王僅遣使進樂一次：即貞元十八年是也。其理由如下：

(甲) 舊唐書音樂志明言貞元十八年，驃國王來獻國樂，是在此年，已無問題。

(乙) 新唐書禮樂志稱舒難陀於貞元十七年獻國樂至成都。然後五譯而至西安，當在貞元十八年。德宗聽了驃樂，大爲高興，就「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所謂遣還者，即指使命完成，離西安回國。由此可知舒難陀至成都是在貞元十七年；至西安在貞元十八年。(新唐書二百二十二下南蠻傳)。

(丙) 舊唐書驃國列傳稱貞元八年進樂一事

為尋求歷史的本質，應以科學方法將我們所搜集的材料（即史料）經過觀察、歸納、分析、比較和綜合的幾種步驟，對於史料的外形與內容加以研究與鑑定，明瞭這種材料本身的原形與原意，這樣才能獲得真的歷史的全貌。

自然，尋求歷史本質的工作是相當的艱難：材料的搜求，考訂的詳密，判斷的精確，種種工作，都不是匆促時間少許精力所能成功的。從事這種工作的人，一面須有豐富的常識基礎，一面要有忍耐不斷的努力，這樣才能收到最後的效果。

#### 四、歷史與求真精神

歷史家的研究歷史和考訂史料，是為獲得歷史的真實，明瞭人類社會的真象，所以他的任務就是發揚求真精神，辨別人類是非。

所謂人事的是與非是相對而非絕對的，今日以為是的，明日也許認為非，去年以為非者，今年也許認為是的。因為社會環境的演進與變遷，是非的觀念也隨之而有變異。但是，歷史上所謂是非應以永久的真實為主，真偽與是非自然有別，歷史家的眼光是久遠的，他應透過了歷史的據點——以尊重重據的求真精神，尋求真實可信的材料，根據這種真實有證的記錄，所說明的理法，以辨別是非，尋求真理。

研習歷史的人應有辨是非求真理——至少是近於真理或合理的——的精神，並將這種態度與精神推廣及於一般人羣社會，深入人心，以期造成人們的一種求真的風氣，凡事都要腳踏實地去做，不驚於虛聲，不馳於空想，而唯以求真的態度，作踏實的工夫，這是科學的精神，也就是史學的精神。現實的中國，事事落後，一般人們競尚虛空的高論，不肯埋頭作實際的工作，人才愈少，國步愈艱，我們今日應倡導史學的求真精神，以圖挽救這古老國家萎靡空洞因循腐敗的危機！

這是史學家與廣大知識階層的责任，也是我們倡導歷史精神的重要原因。

卅七·廿七·工商學院。

介紹艾偉著：

### 出席澳洲新教育國際會議記

周君放

商務版 一四三頁 定價四元

正如艾偉博士在序言中所說：「在這本小冊子內我所寫的雖相當龐雜，近似一種遊記，而在實質上，卻有關教育學術的動態。」誠然我們讀後也有這種的感覺，是著者以一種遊記寫作的體裁，報導着有關會議進行的情況和學術演講及交換的內容，同時略述及澳洲教育研究概況及其所工作的

，不僅與同書著樂志自相矛盾，且與新唐書亦互相抵觸。此次使臣，亦是驃王之弟，自各方面證之，亦必定在貞元十八年。

(丁)在不佞所著的中緬關係史中，曾經詳細討論唐朝與緬甸的交通。自戒卅開邊縣，亦即自今日的宜賓至大理，往返需時三月。那麼就可知道自緬甸至西安往返一次，至少亦得一年半載。誠如哈威所言，如何能於兩三年內，驃王向中國進貢兩次。故由三種史料考證的結果，可知緬使，僅於貞元十八年，向中國進貢一次。姚枬先生對此亦無註解，不知是否默認此說？

第一冊，一〇三頁稱：「據哈威原注云：馬可波羅所記大致無誤，惟尚有須訂正者，蓋緬王那羅梯訶波帝未嘗親與是役，而雲南諸路宣慰都元帥，納速刺丁亦不在場，僅於戰後率軍直下江頭而已。作戰地點，亦不在永昌東北七十里之平原，而在干額附近太平洋流域之平原，屬永昌府」。哈氏所稱納速刺丁亦不在場，不知有何根據？元史明言：「元軍統帥為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燹，摩些軍（元史作摩此）三千八百四十餘人征緬至江頭。」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鐵證，我們怎能說，納速刺丁沒有參加作戰呢？至於所言作戰地點，大致相近。據元史兩軍初次接觸，當在大盈江（亦曰大平江）上游，南甸至盈江山谷間。以後元軍進展至盈江西北，干崖附近。海拔高度約在二千公尺左右，地勢稍較平坦。此地離永昌甚遠，不屬永昌府而屬騰衝府。（元史地理志證明於下）。這種極小的錯誤，實在因為他沒有看一看地理志或是看一看干崖，大盈江究竟在甚麼地方。上列諸地在騰衝的

範圍，有許多值得借鏡的地方，這帶有多少輕鬆性質，學術氣味不過于太沉重的著作，倒是值得抽閱一讀的。

著者這次是代表教育部及教育學術團體聯合會出席新教育同志會國際會議的。新教育同志會 (New Education Fellowship 簡寫為 N. E. F.) 為一世界性學術機構由趨向進步之人士，教育家及為人父母者所組成。彼等相互團結，對於教育態度一致。其在基本目標上雖屬如此，但其所探之方法，可許不同，蓋各就其地方情形及其需要，仍可達到同一之目的。N. E. F. 於一九一五年由恩索夫人 (Mrs. Beatrice Enson) 創立於英國，已成為一種國際性的組織。其主要任務在從個人及社會之自由哲學上，討論世界上一般的教育問題。其國際總會設在倫敦，戰前此種自治性之分會成立者已有五十一國之多。

這次澳洲會議所應進行之要點如下，係根據上次倫敦會議時所議決者：

- (一) 將世界當前嚴重問題公之大眾，並說明藉教育力量在國際間可以增進了解養成善意。
- (二) 在會議期間與澳洲及其他國教育家繼續研究，並討論在英倫所討論之問題。
- (三) 予代表各國(澳洲在內)之教育思想界及行政界之領袖以交換意見及經驗之機會，並藉此以研究及討論彼此有益之教育問題(頁一三)。參加的代表有英，中，澳，荷，美，法，印度，波蘭，捷克，新西蘭諸國。

這個會議並不是在一個固定的地點進行的，而是以週巡方式在澳洲數個名城中演講，講員由各代表担任，可說是一個講學會，倒是一種別開生面的會議方法。會議在卜利士本 (Brisbane Capital of Queensland)，雪梨 (Sydney)，美本 (Melbourne)，塔斯曼亞 (Tasmania)，艾的瑞 (Adelaide) 波史 (Perth) 諸城中陸續舉行。演詞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差不多有關的教育問題都觸及了。六週會議中演講數二一四次，聽講人數八三八〇，其他還有教育實驗工作所攝成的電影。講題的內容有(一)託兒所及幼稚教育(二)小學教育(三)中等教育(四)成人教育(五)兒童及青年心理(六)測驗與統計(七)教學法(八)實驗教育(九)教育哲學(十)比較教育(十一)師資訓練(十二)教育與社會(十三)社會心理學(十四)教育與民主，其內容可謂宏博矣！著者艾偉博士所講的題目，其較專門的有(一)中國戰前及戰後小學兒童能力之測量，(二)智力學力及體力之相關研究，(三)三種大專考試方法之比較研究，(四)教育上的新趨勢，而介紹中國教育一般情形的有(一)中國之戰時教育(二)教育測驗在中國(三)中國文學及其心理學的研究(四)中國兒童生活(五)中國教育與國際了解(六)中國之小學教育測驗(七)中國之婦女教育(八)中國心理學之發展等，此外尚有許多即席應酬的短篇演講，至其他各代表之論題也甚新穎，收穫殊為豐富，其詳細之內容，俟將來新教育同志會英文年報出版，當有機會披露也。

會議閉幕時會共同發表宣言，為各代表交換意見的結果，吾人從這裏可略窺見一般教育家對現

南邊，離永昌甚遠，如明能屬永昌府。如果如果滇西在元代沒有騰衝府，只有永昌府，倘有可能。可是元代既有永昌府，又有騰衝府：

元史六十一地理志載永昌府：「唐時蒙氏據其地，歷段氏，高氏皆為永昌府。元憲宗七年分永昌之永平立千戶。至元十一年立永昌。三十五年升為府隸大理路領一縣：永平」。騰衝府：「在永昌之西，即越賤地。唐置羈縻郡。蒙氏九世孫異牟尋取越賤逐渚蠻有其地為軟化府。其後白蠻徙居之，改騰衝府。元憲宗三年府酋高救內附。至元十一年改騰越州，又立騰越縣。十四年改騰衝府。二十五年罷州縣府如故」。

總之這兩個問題，比較關係大，故特別提出來，討論一下。無論如何，這實在是一本很好的漢譯世界名著。

一九四八、三、三日於南京北極閣山齋。

(上接第十頁)

(註四)畫源，宋江南鍾陵人，字叔遠，曾充兩唐北苑使，為宋初山水畫大家。

(註五)巨然，宋僧，江寧人，工畫山水，師畫源，世稱畫巨。

(註六)米芾，宋襄陽人，字元章，宣和時書畫博士，工書畫世稱大米，其子友仁，字元暉，亦工書畫，世稱小米。

(註七)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痴道人，王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吳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四人俱工畫，稱元代四大家。

(註八)李成營丘人，字咸熙，宋初山水畫大家。全五代長安人，為五代山水畫大家與荆浩齊名，世稱關荆董巨。

(註九)黃公望亦號一峯。 卅七年八月上海美術

世界有關教育問題的看法，其摘要如下：

(一)教育應加發展，應使人類一致承認世界秩序應由各國人民完全並最後管理。所有被公家選舉之代表應對人民負責。

(二)教育在人類腦筋中，無論老少，應建設一種對於世界秩序之忠誠心理。

(三)凡世界秩序所採之步驟，以提高並加深世界任何角落之教育程度，應予支持。

(四)教育對於聯合國大憲章上所載之原則，在具體的及特殊的應用上，應力求合作。(頁一一一—一一二)。

至于著者所述及之澳洲教育情況僅在「聞見雜記」一章比較有系統的介紹。其他各章較少涉及，是我們認為美中不足的地方。此或者是由于著者的工作過於忙碌，時間不够分配的緣故。澳洲是一個新興的國家，百務方舉。至教育方面它有這多的成就與進步是令我們欽佩的。它有二點值得可取的地方，一即教育研究所的設立，一即教師聯合的組織，現將其概況略述如后，以資參考。

全澳教育研究所(The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所址設于美本。此研究所於一九三〇年經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羅素院長(Dean Russell)受美國哈里基金合作社之補助宣告成立。此補助定為十年，期滿復延長三年，先後共得澳金一十二萬一千鎊，在此期內亦會領得澳聯邦政府某部一千鎊及各邦少數款項。現在經費來源似由各邦按人口比例共同捐負。此研究之任務，在對於教育作客觀之研究，及傳播關於此類之知識，其中包括教育問題與社會科學之發展，兒童個性差異在心理及人類測量上之研究等。過去該所所進行之事業有下列數端：(一)對於研究員之補助。(二)印刷資料報告。(三)舉辦調查。(四)編製目錄並舉辦全澳教師服務通訊。(五)編造教育及技能測驗，十餘年來該所所刊印之報告凡近百種。而所編印之智力測驗，經全澳實施者，在二十五萬份以上。最近該所對於全國教育調查實施學力測量，正擬作大規模之進行。前途實為未可限量。尤可貴者為其實驗和研究的成果獲得之後，即予以教育與職業以指導，能為行政當局接受，才不致令研究的成果落空。回顧我國之教育研究與教育行政，實令人浩嘆。

教師聯合會(The Public School Teacher's Federation)，幾於各邦皆有極健全之組織。在下利本及雪梨二處且有所謂教師大廈(Teacher's building)為教師謀福利，是一種工會(Trade union)的性質，其主要任務在(一)為教師謀得滿意的待遇與生活。(二)改善教師等職業上及公民上之地位。(三)在教育便利上求得積極的改進。(四)努力維持並發展一民主式的社會，使教師聯合會能在其中繁榮滋長。其會刊有「教育」(Education, Journal of the N. S. W. Teacher's Federation)「父母與公民」(The Parent and Citizen)諸種。像這樣有組織的機構，實在幫忙教師解決了不少的困難，而我國的教師漫無組織，倒是值得仿效的。

(上接第十三頁)

註十、文史通義書教上。

註十一、隋書經籍志起居注敘謂：「漢時起居注在宮中為女史之職」。

註十二、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

註十三、年鑑種類可大別為專科性與地域性二種，專科年鑑係指述某一專門事業者，地域年鑑如各省年鑑各縣年鑑等。此外復有以機關社團為單位而作成之年鑑正在發展，此亦可謂為專科年鑑之旁支耳。

註十四、黎著方志今議。

註十五、如檔案等先係行政上所用之公文，但隔若干年後，即為良好史料足為一例。

註十六、此所謂刪定鈎玄，頗似章實齋所謂獨斷之學，其方法意義正同。

註十七、如司馬光之修通鑑，先以年月日為標準，將所有史料視其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

註十八、如郭沫若之古代社會，呂思勉之中國通史，錢穆之國史大綱均係鈎玄之功。近人著史類皆採此途徑，以上不過舉其略例耳。

註十九、現今外國人好作日記自傳以及回憶錄等，皆係記述一體而為良好史料。

註二十、我國舊例易代以後即行纂述本朝修萬朝史書地方志。民國間規定三十年修一次。此種分期頗不合理。合理之分期須研究時代史實發展之概況，審度其變換段落處作為修撰之期限。

註二十一、為歐美各國史料叢書等書。

註二十二、我國過去史書多根據朝廷之記注為材料，故其內容偏朝廷事蹟之敘述，明清二代記注先法連朝廷事蹟。故今日記注宜撰大領域亦即將撰大史書領域。

註二十三、近日史家銳意創造，尤于事文之外，對子義的方面三致意焉。此固為一進步但若干方面亦頗欠當。鍾其云係改變史觀非改造史實，然有相反之史觀，認識史實亦相反。

# 周著「抗瘧教育」述評

楊同芳

中華民族久已被人譏為東亞病夫，一般國民體質的衰弱，是極顯著的事實。死亡率比世界任何國家都高，平均壽命不及人家一半，這不但影響個人的事業前途，而且損耗無限的國力，陷國族於衰微。推究其癥結，實由於一般人對健康的漠視，科學保健知識的缺乏，文化水準的普遍低落，都足以促成國民體格的羸弱。有人說中國有四大病根，即貧、弱、愚、私。其實這四者都是相互關聯的，補治之道，厥在救「愚」。因為愚昧，所以才缺乏知識，才不能增進生產，才不知強身強種，才不肯互助合作。因為愚昧，才崇奉鬼神，迷信命運，不想從改善健康條件來爭取自身及社會的福利。因為愚昧，才甘心受自然環境的支配，不能以科學的方法，征服自然所加諸人們的災害，對於一切病菌更不知防範和撲滅。

希臘哲人說：「弱是罪惡，強而不暴是美」，這確是至理名言。今後中國正邁向行憲建國的大道，建設的基礎，全在人力，體力，精神力，只有強健的人才配担当建國的重任，衰弱的國民簡直是國家的累贅。談復興建設，談增產強國，首在健康。一個失却健康的人，等於失去了他的一切；一個國民體力衰微的民族，必無法生存於今日物競天演的世界。中國不欲振拔自強則已，否則便不能再不積極倡導全民保健運動，再不能不加緊普及衛生教育了。

衛生教育的倡導有二個顯著的目標：一是促進個人身心的健康，舉凡增強體力的一切訓練均屬之；一是灌輸普通的醫藥知識，特別是病因及預防等項，必使人們有明晰的認識。增強體力以抵禦疾病是衛生教育所應努力的目標；根據病理以杜絕病菌的滋生，防止一切傳染病的侵害，更是衛生教育的主要任務。

誰都知道，目前國民健康的大敵有三：那便是花柳病，結核症和瘧疾。我們應該拿周處除三害的決心，向人類健康的三大勁敵和剝奪國民幸福的三大病菌搏鬥。關於花柳病的預防和治療，提倡性教育的專家和性病醫師早就注意，坊間所出的這類譯著頗多；結核症為害至烈，差不多成了一般醫師最關注的病症，防癆教育在中國亦漸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但健康三大勁敵之一的瘧疾似乎還少人留心，欲求此項專門著作——特別是強調教育的預防的意義的防瘧專著，那更可說是絕無僅有了。

最近讀到周尚先生著的「抗瘧教育」一書，（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商務印書館初版）頗能應今日教育界迫切的需求，這不僅是一本新著，而且也可以說是一本「創著」，不特我國還沒有見過，即世界各國亦無此項著述，美國有打算譯此書的消息。

瘧疾對吾人健康的危害，不下於花柳病和結核症。據專家估計，世界人類幾有一半受瘧疾之患。瘧疾為國際病，分佈整個地球。華生（W. H. Soper）謂全世界死於瘧疾者達二，〇〇〇，〇〇〇人。許多歷史家證實，古希臘的衰亡是瘧疾的作祟，羅馬、印度的衰落，亦由於瘧疾，足見瘧疾之害，不僅摧殘個人健康，簡直有關國族生存。談到我國，歷年受瘧疾禍患之重，史不絕書。試舉近事為例。據中央勸業委員梁宇皋報告，雲南惡性瘧的患病率及死亡率，遠超他病，影響西南繁榮與國防。梁氏說：「我們到了思茅，在近郊所見的第一個印象是荒了的田，到城裏第二個印象是空了的屋。思茅的瘧疾在民國十三年就開始流行，那時人口還有一〇〇，〇〇〇，現在剩下的只有二〇，〇〇〇了。十四年間人口減少了十分之八。甯洱的情形也是一樣的悲慘，雲州、大理也很凶險。」（見民國二十九年內政部呈行政院之雲南抗瘧計劃草案）其他各地幾無一處不蒙受其害。試如著者說：「瘧疾對於社會的威脅很嚴重，它可以減少人口，危害健康，阻撓軍事，破壞建設，摧毀經濟，和防礙社會進步。」有心人見到這種凶惡的疾患對人們的毒害，能不驚心悚目？

因為瘧疾的猖獗，我國政府當局歷年悉心研究防治方法，在抗戰期間亦曾展開這項工作，並設抗瘧實驗區，推廣種植金雞納樹，創辦金雞納製造廠，更聘專家來華調查設計，雖然成效不大，但以歐美各國的防治工作來看，人類是可能戰勝瘧蚊的，當然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必須持久的努力，像滅殺幼蟲，檢驗消毒，根絕傳染，藥物治療，輔導宣傳等如能切實去做，至少是可以減輕瘧疾危害的程度的。

抗瘧的工作不僅是醫院和衛生機關的任務，同時也是教育工作者所不可忽視的。教材教育的涵義很廣，它應以促進個體與社會的進步的為主要目的，增進個人的健康，維護國族的生存必賴

衛生教育的倡導。醫師的工作比較偏於治療，教育工作者者的使命，則在喚醒人們、警覺人們，指導人們，使他們知道在預防疾病盡最大的心力。「抗瘧教育」的編寫，著者便抱有警惕國人的宏願：「蚊蟲的刺比敵人的刺刀更凶險，這次世界大戰，有些地方死於瘧疾的倍於死在戰場上的人數。我們講預防先要滅蚊，尤該從教育上着手，用教育的力量告訴瘧疾的事實，務使上喻下曉，根除瘧疾。」（見著「自序」）

人類歷史是一部生存競爭歷史，人類的教育亦無非滿足生存競爭的需求，在民主世紀科學時代，人類不應再互相爭奪，應移轉仇敵的對象與迫害健康的病菌進行大規模的殲滅戰。瘧疾既為害人最大的疾患，則教育的設施除指導人類維持相處，相得的美德，還應培養人們對自然界鬥爭的能力，以消除人類真正的大敵，這是教育上最重要的課題，也是每個教育工作者所不容辭的責職。

周先生專攻衛生教育有年，這部十餘萬言的「抗瘧教育」，便是貫徹教育上促進個體與民族健康喚醒人們撲滅人類疾患的旨趣而編著的。刊行於行憲建國的新階段，其意義殆更深長。

這書和純粹的醫學書籍不同，雖然裏面包含着不少醫學上關於瘧疾的專門知識，除了預防外也有治療的方法，可是這本書却是以教育的意義為骨幹的，其所涉衛生教育的性質多於一般醫學的性質，對於從事教育的人和推行衛生業務的人，實在是一本理想的參考書。

全書共分三篇，都十六章，有陳果夫氏序。第一篇可說是一個概述，提供了許多關於瘧疾的

新發見的知識和防治的科學方法，凡瘧疾的生理，成因，辨證，瘧蚊類別，治療藥物等均有詳盡的剖析。第二篇完全討論抗瘧教育，這中間運用了很多的科學教學的技術，在普通醫學書報上是難得見到的。著者給抗瘧教育所下的定義是：「抗瘧教學是一種學習經驗的組織，以資發良好抗瘧知識、態度和行為。」他又指出抗瘧教學的三個機會：「一是在日常生活上教學；二是在衛生公民科目中教學；三是其他各學科的聯絡教學。」關於這些教學的方法，都不厭其詳的加以申述。為使抗瘧教育能貫注到實際的生活，更舉例開發各年級的設計教學。衛生、自然和社會有不劃分的聯繫性，防瘧教學當然應該統括在一個單元裏，不使偏於某一方面。書中教學計劃不是憑空杜撰的，都有實際的證驗。所附「單元設計的實驗報告」，從幼稚園到小學低年級，有故事、唱歌、遊戲、語文、自然、勞作等教材，極活潑新穎。此外，更附載六年級實驗抗瘧教學後的報告，都是廣東著名的一所協和中學及其附小抗

戰期間在澳門時依據本書著者的單元設計進行實驗後的記錄。第三篇敘述抗瘧教育的行政，這是關於抗瘧教育的督導和考績種種，所討論的問題有抗瘧教育行政的基本原理，抗瘧教育的計劃，學校醫務的抗瘧工作，訓練與考核，大抵偏於制度和組織，如果希望抗瘧教育能獲實效，便不能不注意這些問題。

總之，本書優點很多，可說是我國衛生教育專著中一本劃時代的著作。具濃厚的學術氣味，而又不艱澀難讀，其於介紹科學新知，能顧到趣味化的原則。行文流暢，立論精闢，富有極彌重

的警覺性，足能發人深省，不僅以供給知識為滿足，同時更進一步指示衛生行為的實踐，讓大家都知道撲滅人類的勁敵——傳播瘧疾的瘧蚊，一定要靠教育的力量，一定要展開全體的抗瘧運動，才能收到實際的結果，這書便是指導我們怎樣去實踐抗瘧工作的。

書中引用中外統計和實驗報告頗多，且均註出出處，源源有本，極為翔實。關於我國的不少資料，都搜自抗戰期間的書報期刊。立論多根據我國社會的實際情形，與徒然採取外國材料無視本國需要雜湊而成者絕不相同。最難能的，是本書引用古籍，考證瘧疾之由來，融會了中國古代文化的精髓，使人讀了更覺興味盎然。

當筆者涉讀本書以後，深感促進個體康強和民族保健，關係個人和社會乃至全世界的人類，至為重大。際茲行憲之始，全民將着手從事建國工作，端賴國民身心的健強。我們必須履行衛生教育，向一切危害人類健康的病菌搏鬥，抗瘧不過是其中之一端。但是我們却不能忽視這一端，它在傳染方面正不下於花柳病和結核症的威脅力量。科學終必戰勝愚昧，健康終必征服疾病，讀了這本「抗瘧教育」，筆者不禁增加了無比的自信，憑着教育工作者的奮鬥和努力，光明的幸福的康樂的家庭，學校和社會一定是不難建立的。

### 本期作者簡歷

孟憲承——國立浙江大學教授  
王隆鏞——安徽省文獻委員會編纂  
錢君暉——天津工商學院講師  
程宗潮——南京市立師範學校校長

## 教育部三十五年度自費留學考試試題 (十四)

### 直流及交流電機試題 題號 自專65

電機工程學門應考

1. The following data are given for a 6-pole full pitch simplex wave winding generator: Armature diameter = 10 inches, Armature length= axial length of pole=4.25 inches, slots =47, coil sides per slot=4, turns per coil=3, pole arc length=4 inches. The flux density curve is assumed as a rectangle having a length equal to the pole arc. If the voltage between brushes=230 volts. Determine (a) the maximum voltage per conductor, (b) the maximum voltage between adjacent commutator segments, and (c) the maximum flux density if the speed is 1000 R. P. M.
2. The rated current of a 15 H.P., 220-volt 1500 r.p.m. shunt motor is 59 amperes. The armature resistance is 0.2 ohm and the field resistance is 100 ohms. Assume that the torque consumed by the friction and core losses corresponding to the rated speed is constant and regardless of the speed, the moment of inertia of the motor is 55 lb-ft.<sup>2</sup> Determine: (a) the initial acceleration of the motor started at no load with a starting resistance of 3.67 ohms in the armature circuit. (b)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speed of the motor reaches its finally stable value with the starting resistance remained constant in the armature circuit.
3. State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C. motors.
4. Explain why the prime mover characteristics alone determines the kilowatt division of load between alternators in parallel, why is this true of alternators and not true of direct current generators? Why is it undesirable that the prime movers have flat speed load characteristics?
5. A 13,800 volt, 3-phase a.c. generator delivers power over a transmission line which has a

resistance of 17 ohms and a reactance of 1. ohms per conductor to a synchronous motor.

- Both generator and motor have their armatures connected in Y. This motor is rated for 11,000 volts and has an effective armature resistance of 1 ohm and a synchronous reactance of 40 ohms per phase. The effective resistance and synchronous reactance of the generator are, respectively, 2 and 80 ohms per phase. The rotation losses of the motor are 30 KW. and may be assumed constant. For certain excitations of generator and motor, the line current and power factor at the motor are, respectively 50 amperes and 0.9 (lagging) when the motor delivers 1100 H.P. If the excitations are unchanged, what will be the line current and the terminal potentials of the generator and motor if the load on motor is thrown off?
6. A 570-hp., 1,900 volt, 22.5-cycle, 3 phase induction motor is arranged of that it may be connected to the line through a compensator at starting. When the compensator reduces the line potential to 600 volts, the line current is 200 amperes, and the power is 588 KW. at the instant of starting. The stator and rotor ohmic resistances are equal when reduced to the same side, and the effective resistance is 15 times as great as the ohmic resistance. The friction and windage loss at full load is 12 KW. The no-load line current is 56.6 amperes. What is the slip when the motor delivers rated load? What is the starting torque with 600 volts impressed on the motor?

### 化工原理試題 題號 自專67

化學工程學門應考

1. For making quick lime from limestone, compare shaft kiln vs. rotary kiln with respect to
  - (a) Size of unit.
  - (b) Cost of equipment.

(接第一六四期)

# 美國大學教育及圖書館

嚴文郁講  
松光社記

我僅僅根據在美國調查七月的結果，向諸位報告。大學教育的目的可以大略分為四點。第一：幫助發展思想。第二：傳授專門技能。第三：訓練作繼續之研究工作。第四：訓練人們作一個有用於國家，世界，人類的人。現在美國的教育則專在注重專門技術的訓練而忽略了作人的訓練。這似乎比起英國牛津劍橋兩大學的導師制之訓練作人來得疏忽一些。

美國現在要使每一個人均有上大學而且有畢業之機會。固然，像華盛頓這些有名的人物都沒有上過大學。但是，要知道現在的社會越來越複雜，並不是具有普通的一點知識就可以對付得來的。

美國共有大學一千七百所。其中可分為五類：一，普通學院及大學 (College and university)。二，職業學校 (Professional school)。三，師範學院 (Teachers college)。四，(Normal school) 及五，(Junior college)。其中有二十二所歷史在一百五十年以上，哈佛大學最老，三百年，耶魯大學次之，二百四十七年。彭德里亞二百零八年。普林斯登二百年。華盛頓一百九十九年。哥倫比亞一百九十四年。

學生在萬人以上有十四個。紐約大學四萬七千人。哥倫比亞大學，三萬七千人。加利佛利亞大學，二萬七千人。米里蘇達州立學院，二萬一萬人。密西根大學，一萬四千人。全美國在一九四七年有二百五十萬大學生。可是在一九〇〇年，只有七萬，在一九三七年，有一百二十萬，在六十年中，美國人口只增加了三倍，可是，大學生却增加了三十多倍。現在我們全國只有七萬八千九百零九個大學生，比起美國來，真要說我們的教育落後了五十年。

在二次大戰以後，有一百萬為戰事服務過的青年回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第三九七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到了大學中。只要他們自己的程度夠高，他們是有優先權進入大學的。他們進學校，不但免費，而且是照樣拿薪水。未婚的每月六十元，已婚的每月一百元，普遍的看來，這批年紀較大為社會服務過的青年成績較佳。

美國的大學教育有幾個趨向：一，以造成通材爲主。二，注意自己學習 (Self education) 三，雖然美國要使每個人均有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但是，他們仍然很注意程度，沒有 Average B 是不能夠進大學的。以致現在尚有四萬學生徘徊於大學的門外。

大學圖書館的使命，大概的談來有四點：一，準備同學及教授對課程有關之讀物。二，準備學生自我教育有關之讀物。三，收集古今不同之著作，使學生對人格修養有所借鏡。四，訓練學生利用圖書。

一九四〇年，美國一千三百二十一個大學中，共有圖書七千一百六十萬冊。藏書超過一百萬冊的有十三個大學。哈佛大學共有書四百七十萬冊。每年增加四萬冊。排起來有三哩長。若照着這樣增加下去，本世紀末可以達到二千萬冊，五百年以後，可達到五千五百萬冊，排起來有一千四百五十哩長。其次加利佛利亞有三百六十萬冊，耶魯有三百四十萬冊，哥倫比亞有二百萬冊。

藏書分佈各處不同。以美國東北部爲最多，其次西北部，再其次是中部，最少是西南部。平均每位大學生有五十八點九冊圖書，東北部平均每人有七十七點一冊，中部每人有五十九點七冊，西北部每人有四十八點三冊，極西每人有四十六點七冊，西南部每人有三十七點八冊，每位大學生所化的圖書費分配如下：普通學院及大學，最高的達八十一點八元，最低的至零點四元，平均十二點六元，師範學院最高的達四十一元。最低的是零點三三元，平均十一點五二元。職業學校最高的是三十

七點五元，最低的是零點三八元，平均十一點零二元，Normal School 最高達三十三點四元，低至二點七四元，平均四點九三元。Junior College 最高的達一百五十三點四五元，最低的是一點一三元，平均八點三五元，學校人數在八千以上者，每人平均化二十元，八千以下者，平均化二十五元。

美國圖書協會的規定，各校圖書館經費應佔該校經費的百分之四。普通一般調查的結果：普通大學及學院佔百分之三點八三。師範學院佔百分之四點六八。職業學校佔百分之二點二二。Normal School 佔百分之四點二二。Junior College 佔百分之三四點三三。

現在我們國內每年要花很多的外匯送留學生出國。但是，據我調查和留學生的談話中，知道在國外，只有多幾本書而已。既然如此，那我們何不多買幾本書呢。(按：本文係羅斯福圖書館館長嚴文郁在重慶大學講演的筆錄。原刊於重慶世界日報。)

## 讀書通訊半月刊

第一六三期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委員 朱有燾(主編) 李季谷  
秉志 盧于道  
杜佐周 朱伯康

發行人 劉百 閱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電話：九一七〇五  
電報掛號五一二二三

每月十日、二十五日發行

預定請先惠金圓貳元

定價金圓壹角伍分